
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湖南省级数据的实证

湖南大学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刘玉珂

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邝湘敏

摘要：从制度因素的角度，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以湖南省为例，通过构建一个制度的综合指标体系，进而分别得到不同的制度因素指数，并通过对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综合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湖南省各项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湖南省

基金项目：湖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应急项目(编号：11HDSK070)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发生，大量的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经济现象。有学者把中国的奇迹归结为技术的进步，有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有的学者却指出制度因素的变化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最终根源，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沿着这一思路，很多的学者针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的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证明制度的确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看来，这些研究似乎是具有说服力，但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是否真的是制度；如果制度真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如何；不同的具体的制度因素以及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同时不同区域的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等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和商榷的。

1 文献综述

在研读了国内学者有关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正转型着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首先是从制度因素的衡量和指标的选取上有所不同；然后是从指标数据的选取和计算上存在差异；最后是从区域的范围来分析。

首先，在制度因素的衡量上看。以金玉国^[1]为代表的学者则把经济制度的变革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认为产权制度的多元化、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利益分配的企业化和个人化、开放程度高度化是中国宏观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有所不同的是，李春涛等人研究法律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生产者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法律保护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2]；但是以许标文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非正式制度才是影响中国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3]。

然后，从指标的选取上来看。考虑的因素和分析的侧重不同也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只是挑选制度因素中的一个变量来衡量制度，如洪名勇^[4]仅仅从所有制结构一个方面来研究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选择了三个主要的指标来衡量，如金玉国^[1]和赵理想^[5]以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来衡量制度，而何承伟^[6]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相应选择了交易费用、所有权和市场化程度三个指标作为制度因素的衡量；第三，有些学者^[7]则选择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四个变量来衡量。

最后，从选取的区域范围看。高萍等^[8]按照中国的区域布局分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认为制度变迁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不同的影响的结论；而赵理想^[5]用面板数据的方法把全国分成了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果是经济体制、产权制度、对外开放程度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钟心桃^[9]和龙雯月^[10]分别对广东省和陕西省的经济制度变迁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制度因素的选取上，还是在数据的选用上，都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如，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考虑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数据上的选用上也存在很多的分歧，且选取的区域都具有典型性，要么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要么是西部的不发达省份。鉴于此，本文以湖南省为例，首先对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然后通过建立制度指标体系，分别得到经济制度指数、政治制度指数、经济制度指数以及综合制度指数，接着对各个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的结果表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综合制度对经济增长是有正向影响的，最后对湖南省各项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劳动、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这点毋庸置疑，正如傅晓霞^[11]所指出，资本和其他资源要素的增加、知识的增长及应用和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程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是 North^[12]却认为制度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即经济组织，随着该结构的演进，促使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发展，甚至还把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归结为其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国彦兵^[13]也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了可以足够的激励机制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体系，从而改善要素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指出甚至在没有其他投入要素增长而仅仅只有制度创新的极端情况下，制度的建立不仅仅减少了交易成本，而且还减少了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间的差异，通过激励个人和组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不仅如此，现代经济既是市场经济和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经济制度是基础，政治制度是保障，法律制度是重要支撑。鉴于此，本文拟在以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在经济制度方面。金玉国^[1]就指出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产权制度的多元化、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利益分配的企业化和个人化、开放程度高度化四个方面，而洪名勇^[4]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领域的主要变化表现为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以及所有制结构上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因此，本文把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政府干预程度作为经济制度的主要体现。其理由在于：产权制度的多元化不仅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11]；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在于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调节机制，“无形的手”为要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基本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方式，让它们自觉的流向能够体现其最大价值的地方；对外开放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包括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仅仅有利于扩大商品的交易，而且还加速了资金的流动，同时对高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的吸收和引进，在更大的国际视野上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空间；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具有不容置疑的存在意义及价值，然而过多的干预市场，会影响到市场竞争的程度和水平，从而导致了经济效率的降低。

其次，在政治制度上。经济的运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而在此基础上，政治民主成为政治制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Matthew A. Baum 和 David A. Lake^[14]就认为政治民主是经济的刹车或者是助推器，因为政府不仅仅能够提供产权保护、收入再分配外，还能通过提供公共服务间接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Hristos Doucouliagos 等^[15]认为民主通过更高的人力资本、更低的通货膨胀、更低的政治不稳定性和更高的经济自由度来对经济产生很强的影响。可见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体现为民主的政府是否建立、社会贫富差距程度、社会就业水平、物价是否稳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善以及政府服务水平是否提高等等。

最后，在法律制度上。正如前文所述，产权的多元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产权的明晰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基础，产权的有力保护和合同的有效执行也需要法律制度作为后盾。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如：Dawson^[16]的研究就表明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产权的保护；Acemoglu 等^[17]也指出法律制度对于产权的保护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产权制度通过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李春涛和薛奕^[2]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法律保护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

3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3.1 变量的选取与指标的衡量

本文选用经典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计量分析，数据来源于 2011 年的《湖南省统计年鉴》，选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劳动力、人均资本、各个制度因素(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总的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其中用年末城乡就业总人数来衡量劳动力，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衡量资本，与价格有关的变量均扣除价格因素。而各项制度因素都是由下文所介绍的制度指标体系的构建所得到了指数，具体的衡量指标见表 1 制度指标体系。

3.2 制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很多的学者仅仅选取制度因素中的某一个方面，这并不能全方位的反映制度因素的作用，因而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一个制度因素的评价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来分别得到经济制度指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指数和综合的制度指数。

表 1 制度指标体系

Tab.1 System of institution indicators

因子	指标	权重	
正式制度	1 经济制度	0.6334	
	1.1 产权指数	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0.1084
	1.2 市场化指数		0.5551
	1.2.1 资本市场		0.4007
	1.2.1.1 非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0.5073
	1.2.1.2 外国投资与 GDP 比例	外国投资/GDP	0.4927
	1.2.2 劳动力市场		0.3978
	1.2.2.1 非国有职工比重	1-(国有职工人数/年底职工人数)	0.5159

1.2.2.2 国有职工工资收入比重	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工资总额	0.4841
1.2.3 技术市场	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人口总数	0.2015
1.3 对外开放指数		0.2220
1.3.1 对外贸易程度	进出口总额/GDP	0.5314
1.3.2 实际利用外资程度	实际利用外资额/GDP	0.4686
1.4 政府干预程度	政府消费/最终消费	0.1145
2 政治制度		0.2209
2.1 就业程度	城镇登记失业率	0.3269
2.2 物价指数增长率	物价指数增长率	0.3383
2.3 提供基础服务设施程度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数/人口数	0.3348
3 法律制度		0.1457
3.1 已申请专利程度	已申请专利数/总人口数	0.4994
3.2 已批准专利程度	已批准专利数/总人口数	0.5006

本文在借鉴了上述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 1995 年至 2010 年的湖南省的统计数据，为了避免数值过大和单位不一致而对可比性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对每一个指标的数据取了相对数（即比值），同时通过较为客观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了制度合成评价体系（表 1），其中权重的含义表示的是每一个指标在其所处的相同级别的体系中的权重，如产权指数、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在经济制度这一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0.1084、0.5551、0.222、0.1145；又如市场化指数中，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0.4007、0.3978、0.2015；其余以此类推。

由表 1 可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0.6334、0.2209、0.1457，经济制度在制度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制度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可见制度的变迁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经济制度上，经济制度的变化占据主导地位，而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化稍稍滞后，经济现实也验证了这点；而由产权指数、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所构成的经济制度中，四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0.1084、0.5551、0.222、0.1145，从这一比重可以获悉市场化指数的变化引起了经济制度的绝大部分的变化，也透露了市场是经济的主要特征，尊重市场是走向经济自由的必要前提；进一步的看市场化指数，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所占比重相当，可见要想让经济迅速市场化，同时让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三种基本要素市场化是一种很重要的途径；从构成政治制度的结构体系中，也同样的看到各组成成分的比例相当，由此可知，政治制度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它给人们提供的是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的政治环境和居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3.3 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制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得到了在制度体系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因素的权重，并且分别得到了经济制度指数、政治制度指数以及法律制度指数，从而得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综合制度指数。在回归分析中，分别用 GDP、K、L、INSE、INSP、INSL、INS 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资本、人均劳动、经济制度指数、政治制度指数、法律制度指数以及综合制度指数，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2。

由表 2 的回归结果可知，从单因素看，无论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还是综合的制度都对经济增长均有正的影响；从多因素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一起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时模型拟合的较好，而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以及三个制度因素一起共同作用时模型拟合的并不是很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制度之间就没有相互作用和共同作用，这也许是数据或者是模型的原因。可见，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容忽视。

由以上的结果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一化三基”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四化两型”战略富民强省的逐步实施，湖南省在经济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变化以及在整个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制度因素的确有利于最基本的资本和劳动等经济增长基本要素效用的发挥。尽管制度因素制度的交互作用及相互作用，在模型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但是不能否认各个制度因素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制约的关系，恰恰相反，各个制度因素之间的协同变化是必然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表 2 湖南省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Tab.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Hunan province exerting on economic growth

GDP	(1)	(2)	(3)	(4)	(5)	(6)	(7)	(8)
C	-326.2721 [*] (-2.0875)	-535.5787 ^{***} (-3.9000)	-489.4949 ^{***} (-3.5532)	-346.9505 [*] (-2.4735)	-347.1851 ^{**} (-2.2351)	-505.4591 ^{***} (-3.9732)	-364.5895 ^{**} (-2.6160)	-308.5604 [*] (-2.2517)
L	3.349 ^{***} (26.7982)	3.1355 ^{***} (28.3665)	2.6436 ^{***} (8.2935)	3.296 ^{***} (28.6711)	2.9647 ^{***} (8.3125)	2.6403 ^{***} (8.9924)	2.9579 ^{***} (9.2623)	3.3315 ^{***} (32.1519)
K	524.3438 (1.5907)	1046.853 ^{***} (4.18433)	971.8162 ^{***} (3.8586)	552.4337 [*] (1.8705)	591.2313 (1.7889)	986.9307 ^{***} (4.2512)	610.4717 [*] (2.0619)	465.953 (1.6242)
INSE	2.2746 ^{**} (2.2274)			2.196 ^{**} (2.4006)	1.7933 (1.6429)		1.7731 [*] (1.8142)	
INSP		2.0552 [*] (1.7773)		1.954 [*] (1.9953)		1.8895 (1.7727)	1.8707 [*] (1.9291)	

INSL			20.3825* (1.8035)		13.157 (1.1485)	18.7802* (1.7973)	11.6519 (1.1328)	
INS								4.0282* (2.9718)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4 政策建议

随着改革的春风由东南沿海逐步吹向中西部地区，从 2005 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到 2007 年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批准，湖南面临着发展的重大机遇，中央各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扶持力度的加大，同时湖南省抓住中央“中部崛起战略”和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大契机，推进“一化三基”战略和“四化两型”战略富民强省，提出以长株潭为核心构建“3+5”城市群，建设湘中经济走廊，发展湘西经济带，实施大湘南战略，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正是由于这些重大举措，引起了湖南省内各项制度的不断变革，才有了湖南省的经济实现了重大突破，并取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大关的骄人成绩。

然而伴随着湖南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相继暴露。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除此之外，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城市房价涨幅过高，社会矛盾增多，食品安全问题，腐败现象严重以及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无助于经济的可持续性，也有碍于各项机制体制的改革进程。针对这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深化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制定明晰产权的制度，清晰的界定产权，让要素效用的发挥有个好的开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产品市场以及要素的顺畅流动提供好优质的经济环境；同时逐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迈出去”；而且要转变政府服务经济的方式，尽可能的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

第二，加快政治制度改革的步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政治制度的保障，稳定才能压倒一切。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清廉政府的建立、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社会就业水平的提高、物价水平的稳定、便民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服务水平的提高等等都是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改革才能实现的。

第三，不断推进法律制度的改革。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完善并且有效的法律制度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因此，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法律的执行和监督、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刘玉珂(1965—)，女，湖南长沙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产业经济、资源与环境、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等。E-mail:lyk6699@126.com。

参考文献:

- [1]金玉国. 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 财经科学, 2001(2): 24-28.
- [2]李春涛, 薛奕. 法律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省面板数据的证据[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0(3): 139-152.
- [3]许标文, 郑非.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 财经科学, 2007(12): 39-46.
- [4]洪名勇. 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2001(3): 28-31.
- [5]赵理想. 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7(2): 12-16.
- [6]何承伟. 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 科技广场, 2007(4): 48-50.
- [7]靳涛. 揭示“制度与增长关系之谜”的一个研究视角[J]. 经济学家, 2007(5): 18-26.
- [8]高萍, 孙群立. 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06(11): 53-60.
- [9]钟心桃, 龚唯平. 广东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对要素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 南方经济, 2008(4): 75-81.
- [10]龙霁月, 常云坤. 宏观经济制度变迁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J].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8(1): 106-114.
- [11]傅晓霞, 吴利学.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02(4): 70-75.
- [12]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1): 97-112.
- [13]国彦兵. 新制度经济学[M]. 上海: 立信出版社, 2006.
- [14]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Task of Economic History[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8, 10(5): 963-978.
- [15]Matthew A. Baum and David A. Lak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Democracy and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3, 47(2): 333-347.
- [16]Hristos Doucouliagos and Mehmet Ali Ulubasoglu.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Analysi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52(1): 61-83.
- [17]Dawson, John W. Institution, Investment and Growth: New Cross-Country and Panel Data Evidence[J]. Economic Inquiry, 1998(10):603-619.
- [18]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A.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 369-1 401.